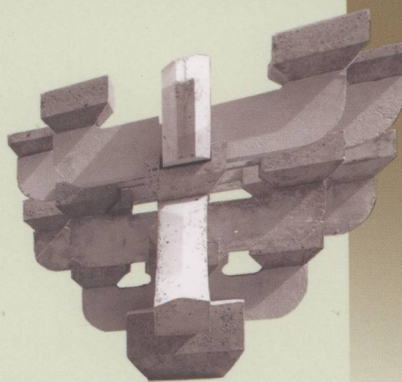


何兹全 主编



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唐宋都城社会结构研究 ——对城市经济与社会关注

宁欣 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主编 何兹全

唐宋都城社会结构研究

——对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关注

宁欣 著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都城社会结构研究:对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关注/
宁欣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05907-7

I. 唐… II. 宁… III. ①都城—城市社会学—研
究—中国—唐代②都城—城市社会学—研究—中
国—宋代 IV. 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083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
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唐宋都城社会结构研究
——对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关注
宁 欣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907-7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1/4

定价: 27.00 元

总 序

何 兹 全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与发展,我们策划组织了《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并把它作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主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有重视中国社会与政治史研究的传统。解放初期,侯外庐同志任历史系主任,为重视社会与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后多年在白寿彝教授的主持下,这一传统一直得到了保持并有所发展。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这是坏现象,也是好现象。这正好促使中国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历史作更深入的研究。

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开始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论文。我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库”之一再版),2003年晁福林教授出版了《先秦社会形态研

2 总序

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两部书,在中国史学界都起到了推动中国政治史研究的作用。

我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很多学有所成,大部分成为高等学校和研究部门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他们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国政治史的专著和论文。他们也是这套丛书的主要作者。

通观中外学术思想的历史,无论哪一门学科,往往走着一时重思想一时重材料,一时重整体一时重局部的发展路程。孔子所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篇》),可以引申来说就是偏颇的为害。孔子高明!

中国社会史研究虽然时间尚短,但大体上说,也不免有走这种偏颇道路的情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一出生就是以社会史论战的面貌出现的,偏重理论;不久就出现《食货》派,被认为重材料。解放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自然是重理论的,其结果则是被目为走向教条主义。上世纪80年代后的社会史研究又出现重材料,重局部,重个别社会问题的研究的动向。

历史经验是值得重视的。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不能偏重哪一方面。

理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理论是研究深入中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认识客观的能力。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客观的认识才一步步地深入。

因此,理论和材料的关系是相互为用。要两条腿走路,缺一条腿就成为瘸子。

自古就有这样一句话,说是“坐井观天曰天小。非天小也,所

见者小也”。坐在井里看天,只能看到天的一部分,就说天小。不是天小,是你所看见的小。作学问,要宏观、微观结合。要能真实的看到整个社会,才能认识你看到那一部分社会和问题。研究任何一点一面的社会,必须有全面的观点,认识了社会的全面,才能真正认识你所见的部分。

自古以来,研究学问,往往出现这两者的偏差,不是重宏观、重理论,就是重微观、重材料。

我们编这套《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要重视历史上所走过的弯路,重视这种偏差。一本书也可能材料多些,也可能理论多些;一本书可能重在宏观,也可能重在微观。但我们希望整套书,是在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这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正路,是做学问的正路,也是我们编这套书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海外商品经济、技术和资本涌入中国,西方国家的学术、史学思潮和著作也涌入中国。辩证唯物史观一时有进入低潮的趋势。这是学术因素以外的人为原因造成的。辩证唯物史观还有极强的生命力,是先进的。

我们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以辩证唯物史观推动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我们坚持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道路,避免偏颇,并决定从《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做起,以后再逐步扩展,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推动中国历史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目 录

绪论	1
----------	---

上 编

唐宋城市经济社会研究的几点想法	12
唐宋都城经济社会空间的拓展(上)	18
唐宋都城经济社会空间的拓展(下)	36
唐宋都城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	54
街道:唐代都城社会的线形空间(上)	75
街道:唐代都城社会的线形空间(下)	107

下 编

唐宋都城人口结构变化与畸形消费的增长	133
城市流动人口与选举	151
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	211
物流与商流:变动中的都城经济社会	238
唐宋都市生活服务业概观	317
城市商人的发迹之路	351

2 目录

附 论

笔记小说的演变与唐宋城市社会研究	371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笔记小说与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	385

附 图

图一 唐长安城示意图	409
图二 唐洛阳城示意图	410
图三 北宋东京城示意图	411
图四 南宋临安城示意图	412
参考文献与参考论著	413
后记	423

绪 论

我们关注的城市经济与社会,是指在城市范围(包括大都市圈内的周边及辐射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形成的关系以及带来的相关变化。这既是一个传统的领域,也被视为历史研究的新方向^①。

城市变革是唐宋社会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城市为中心、以城市发展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城市的变革昭示了社会深刻而全面的变化。中国传统城市变革过程中,都城的变化是最引人瞩目的,并且最具典型意义。

与都城(城市)研究有关的城市发展史阶段划分有几种不同角度^②:

从中国城市发展阶段看:以宫殿城池阶段为城市主体的秦汉时期,以坊市制度为标志的隋唐时期,以坊市合一、临街设店为特

① 参见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

② 关于城市史研究综述,参见曲英杰:《近年来中国古代城市问题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 年第 7 期;曲英杰:《近年来古代城市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 年第 9 期;曲英杰:《近年来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 年第 2 期;朱士光:《八年来中国古都学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 年第 5 期;中村圭尔、辛德勇主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皮明庾:《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 年第 3 期等。

2 唐宋都城社会结构研究

征的宋以后时期；

从中国都城史角度看：中国都城在两宋时期开始由中原型向近海型转移；

从城市规模看：以隋唐两宋时期为界，中国传统城市规模达到顶峰，城市人口达到一二百万；

从城市布局、重心分布看：唐宋时期城市重心发生了由北向南的转移；

从城市观念看：宋以后，突破墙的观念界限，很多城市人口增加使得城外居住了大批居民，但不再仅以扩建外城的方式把他们扩进来。南方市镇、草市的兴起，已经冲破围墙的桎梏；

从城市人口构成看：两宋时期，市民阶层逐渐兴起，城市工商业人口比重加大；

从城市文化结构看：市民文化成为宋以后城市文化的主流。宋以后新兴的文学艺术——说话、话本、元曲、杂剧、小说、曲艺、戏剧，都是因市民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士大夫也因城居而更接近市民阶层。

从不同角度审视唐宋城市变化，对研究中古时代城市有很多启发。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城市的数量、空间分布、职能和类型、人口数量和结构、人口流动、人口文化结构、城市网络体系、城市市场商品流通和商品结构的变化，是城市变化乃至社会变化的集中反映。

唐宋时期也是历史上城市人口流动频率较高的时期，大量的人口频繁的面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是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显著表

现。从考察商品经济发展与城市变迁的互动关系入手,能进一步了解唐宋城市变迁过程的特点以及与城市生活各个层面及周边生态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

以都城社会为中心的研究,为不少学者所重视,对我的研究影响比较大的有:

一、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为代表的城市社会经济研究;
二、以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为代表的都城制度综合研究;

三、以史念海“古都学”创立为起点的历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交叉研究;

四、以妹尾达彦系列研究为代表的都城研究新空间(全球视野、礼仪空间、宇宙都城等)体系。

此外,李孝聪的城市地域研究,荣新江的长安研究及综述,辛德勇的历史地理文献释读考证等的多视角研究,阎文儒、李健超、杨鸿年等人对城市文献考实性著作,城市史比较研究等,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从近几年的研究侧重点看:

一、都城研究长盛不衰,新的研究热潮不断涌现;

二、城市比较研究更为宽泛,不仅包括相关时代城市的比较,还从研究者的立场出发,透视城市研究的新课题;

三、城市史研究已经全面展开,近几年更重视对地下遗址、遗迹的考察,诸如城池、宫阙、墓葬、窖藏,文物与文献的结合,考古与实地探索的结合。城市社会的研究成为关注热点。

4 唐宋都城社会结构研究

城市社会研究,其中经济社会是我关注的重点。经济社会,我关注的重点是人们在社会空间与相应的地域空间中因经济因素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活动。将城市地域空间的变化与经济关系的变动结合考察,以此探讨在两者的互动中社会结构的变化。

本书虽然用大量篇幅探讨了地域空间的变化,如平面空间、立体空间等,但着眼点是这些地域空间变化与城市经济社会之间的互动,即地域空间的变化是如何反映社会空间的变化,以及社会空间的变化如何促进地域空间的变化。人流、商流、物流的内涵与外延的变化与位移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是书中涉及的问题。

研究的时间框架大体以唐为主,延伸到五代和宋,空间框架以唐长安为中心,以洛阳为辅,以两宋都城开封和临安作为参照,寻访从唐初到南宋五六百年间的都城经济社会变化的点与线。由于对唐代历史接触较多,涉及宋代的都城社会,不免有蜻蜓点水之嫌。

对都城社会变迁整体思考的关注点,一是商品经济与城市社会变化的关系;二是人口结构及变化与城市社会变化的关系,其他问题都是以此为切入点而展开的。

本书并没有涵盖都城社会结构的所有相关问题,也没有被一个完整的框架束缚,只是作者近年研究成果和研究心得真实地展示,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这些关系及变化。本书属于系列研究的整合,主要围绕几个方面展开。

一、对唐宋都城社会变迁的思考

城市作为社会的载体,至少应该包括三个空间概念:一是地域空间,诸如城市区划、布局、建筑等;二是社会与政治空间,诸如居民结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城市管理制度等;三是精神空间,诸如城市文化、城市社会心理、城市观念等。可以说,我们关注的城市空间应该具有多重性和多维性。从某种角度,我们可以把唐宋都城长安、开封和临安城市经济社会的变化梳理为有形变化、张力弹性变化 and 无形变化,具体表现为平面布局的突破、地域空间的拓展、功能区域格局的重新组合、人口流动频率的加快、人口结构的调整、官府职能回应市场的探索与转变等方面。在城市社会经济空间拓展的过程中,都城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在城市社会结构变化与制度创新的互动中,商品经济因素展示了其无处不在的穿透力。

唐宋城市变迁研究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和有待开拓的领域。

二、对都城空间与经济社会关系的再认识

我们关注的城市空间应该具有多重性和多维性。如何将都城(城市)空间研究视角从平面空间的变化,伸展到多维空间的变化,探索性的研究很有必要。

由唐入宋,城市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都市空间的扩展。空

间的扩展无疑增强了都市的吸纳力,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空间的扩展至少具有三维(向)性:一是外延的扩展,以城关为中心或枢纽,以城内主要大街通过城关连接城外的重要官道,使都市的实际区域逐渐向城外扩展,即形成“大都市”(不以城墙为界限);二是城内封闭式的坊市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现为“打墙侵街”、“接檐造舍”等,这是不改变城内空间的情况下,扩大现有平面空间的利用率,增大城内的弹性和流通性,属于内涵的扩展;三是立体空间的扩展,即在占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建楼提高现有土地的利用率,以增加商用和民用宅舍使用空间。但无论是平面面积的扩大,还是立体方向的扩展,都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开拓,也是城市内部结构(如人口结构、社会阶层的构成、社会群体分区特点等)的调整与变化的反映,是传统大都市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表现。

唐宋时期,随着社会变化、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内外的人口流动频率加快,城市流动人口的比重增加,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变化过程中,以城关为中心逐渐形成城关区,城关区经济功能的增强,对以都城为首的大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它表明城市尤其是都城的发展已经突破城墙的桎梏,而扩散到以城关为中心的周边地域。唐长安、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由唐人宋都城空间扩展的渐进性及外来流动人口对城市空间拓展的影响和作用,也反映了城市经济功能边缘化问题。

中国古代城市在空间格局变化的过程中,坊市这种方形格局向街市这种平面大空间布局转换、封闭的坊市管理体制向开放的厢坊管理体制的转换,是中古时期的总体趋势,但以往人们过多关

注了街与坊、街与市在时间和空间隔绝因素的突破,即坊墙的突破、夜市的存在、坊内商业活动。但街道,这种线形空间在突破坊市制度过程中,在都市地域空间的演变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却往往被人们忽视。把街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区,我们在深入探讨时发现,这种线形空间为唐宋城市社会变化过程中的经济社会提供了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舞台,于是我们也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视角和思考。尤其是唐长安城外郭城主干街道具有流动性、延伸性、公共性的特点,具有宣示、警示、炫示、舆论与信息传播等多项政治与社会功能,在坊市制向街市制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在城市社会变迁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以上的研究,应使我们对都城的地域空间概念,有了向多维空间延伸的视野。

三、如何认识流动人口与人口流动 对都城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唐宋之际在中国曾发生过一场“中世纪的城市革命”,即城市形态的转化,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人口的城市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原因之一是中国城市的人口主要是由流动人口构成的,即人口的流动性远远大于稳定性。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审视城市人口,就会发现人口的流动与流动的人口是城市发展的推动力,也是城市发展的晴雨表。我们应充分认识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影响,它远远超过了他们本身在城市人口数量中的比重;而人口结构变化产生

的互动效应,又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中古时期城市面貌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形成的消费市场高度繁荣,这其中有因经济发展、收入增加、人口膨胀、城市生活活跃而形成的正常消费行为,但也有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非正常或畸形消费行为,即奢侈性的消费行为。由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商品经济的繁荣,含色情内容的娱乐及餐饮业有很大的市场。这种畸形消费的主体是唐代城市中最活跃的消费群体,以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为主,包括进京参加选举的举子、选人和工商业者。他们不仅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其趣向还引导着城市消费的潮流,构成都市生活色彩最斑斓的部分,这也是唐宋时代城市社会生活日趋世俗化和平民化的表现。

四、审视市场与都城(城市)社会的新视角

中国古代社会影响城市市场变化的因素是多重的,我们可以尝试从不同角度观察。

唐朝“宫市”因宦官为患而备受抨击,又因白居易一首《卖炭翁》而广为人知,如果从财政体制变化的角度考察,我们应该对“宫市”现象有一个新的认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大了内廷对市场的需求量。政府供给系统中市场采购比重逐渐增加,原有供送系统在人员和经费方面已不能满足宫内的即时需要,这正是“宫市”置使、权限扩增、人选趋重的主要原因。在宦官势力持续膨胀的过程中,“宫市”积弊成蠹。都城市场与内廷供给体制变化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国家财政体制的变化,也关系都城市场结构的变

化。唐宋时期,官手工业从顶峰走向衰落,白银货币化程度加深,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刺激内廷对市场需求增加,政府市场采购份额逐渐加大,采购范围逐渐拓宽等,都是促使政府财政体制中的供应体制,由供送制为主逐渐向采购、供送并举过渡的积极因素。但在面对市场的政府行为及其运作中,非经济因素困扰、阻碍市场的培育与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非经济因素对市场经济干扰具有顽固性及持久性,“官市”为害的现象,仅仅反映了问题的一个侧面。

人口数量影响物流的绝对规模,而人口结构影响物流的形式和供应方式。中古时代的都城是当时最为重要的物资消耗地,考察唐代长安的物流诸方面发生的变化具有典型意义。物流的流动幅度、布局、方式、技术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反映社会经济、城市经济的变化和发展,最核心的是商流因素的逐渐增加,推动着中古社会,尤其是城市的变迁。尽管唐朝末年,长安的物流受到毁灭性打击,然而历史发展的进程并未因此而被打断。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对物流提出新的要求,物流的诸个方面也继续沿着唐后期以来的轨迹和趋势而发展着。某些新因素虽然尚处于萌芽或生长状态,但在迈入两宋城市社会和城市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后,我们可以看到持续发展的态势。

生活服务业是依托城市发展而兴起的行业,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服务业逐渐从传统的商业中分离出来,成为我们今天所概括的“第三产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拓宽和延伸它被赋予的内涵和外延。当我们思考中国古代城市发展问题时,生活服务业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领